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
沈雲龍 主編

楊永泰先生言論集

楊璿熙編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印行

楊永泰先生言論集

楊永泰暢卿先生傳記初稿

翁靜秋

楊公永泰，字暢卿，廣東高州茂名縣人，爲前清楊頤侍郎房侄，其王父若增先生早故，遺腹生公，不久，母鄧夫人亦去世，由祖母撫養成人，轉過繼已故伯父史雲爲兼祧子，嗣母蘇季端，素稱賢淑，教導有方，奠其始基，七歲就傳，天資聰穎，過目成誦，且能了解意義，逢塾師考問，應對如流，衆皆驚爲神奇，十二歲，應縣學試，輒露頭角，曾登案首，而補博弟子員，識者早知其非池中物矣。

值科舉廢，學校興，高屬僻遠，人多不主外遊，嗣母高見，獨排衆議，遣其負笈赴粵垣，就讀廣雅書院，時清政不綱，革命思想，充滿全國，廣雅學生，亦傳風氣，常有集會，或請願運動，公年僅十四，爲校中最幼，但以頭腦新穎，應付機警，爲衆矚目，故屢被推爲代表，領導一校學子，後廣雅書院被解散，公乃北上，應北京國立大學試，獲選入法律系肄業，與前北京司法院長徐夢巖，廣東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廖愈簪，地方審判廳長楊崐山等，同班，時人稱爲四傑，公在校中，本來不苦攻讀，但每逢考試，必名列前茅，同儕自嘆其弗如也。

畢業後，一直參加政治活動，民初被選爲省會議員，旋又獲選爲國會議員，供職北京，聲譽鵲起，公知政治活動，離不了競爭，要在政壇上鬥爭制勝，非有團體背景不可，於是着手組織政黨，集中人才，因糾合李根源，谷鍾秀，張耀曾，周善培等，組成政學會。初號召以研究政治學術爲目的，一時俊彥，參加入會者頗多，而公與李，遂居領導地位。後來漸陷入實際政治行動。欲達到自成統系。因與同志多方聯絡，成爲政學系。而推岑春煊爲領袖，自己願以爲助。民國三年，適袁世凱廢除民國約法，另製新約，造

成獨裁，圖謀帝制，軍情嘩然。公在國會，與一班敢言之議員，如鄒魯葉夏聲等，聯起抨擊，袁解散國會，公乃偕意志相同之議員南下，推岑氏爲首領，掛起反袁反帝之旗幟焉。民國四年冬，雲南唐繼堯蔡壽等，反對帝制，宣佈獨立，公在滬以時機已至，乃催岑氏及同志響應雲南，深一層策劃，默察當時形勢，知討袁大計，如單純靠岑氏之聲望地位，在政治上作用，祇可維繫國內人心，而雲貴邊荒，物力貧弱，要與優勢之北洋軍閥相持，無獲勝把握，故必須糾合全國反帝勢力，聯成一條戰線，展開政治攻勢，始可以制袁死命，促成帝制崩潰。第一手法，需要游說兩廣之龍濟光，陸榮廷等，促其起義來歸，以動搖袁氏意志，分裂帝制力量，則西南形勢，一切改觀。有兩廣之充沛之財力物力，始可穩定下來，此爲兼顧周全上策，決議既定，乃派員分途進行。惟時龍濟光昧於大勢，迷戀自己利祿，不爲所動，且違袁命，遣乃兄龍觀光率兵入桂，會桂督陸榮廷率師攻滇，解決雲貴，而袁另令北洋陳宦部，由川率師向雲貴進迫，陸榮廷當時如與龍合作，急進直追，蔡錕護國軍，腹背受敵，岌岌可危。公見說龍無效，乃獻策專向陸氏力說，陸爲人比較忠厚，而且鑒於形勢，卒爲之動，並轉向陸運動龍駐防西江之禁軍：李耀漢合作，結成唇齒相依之勢，然後佈置廣西獨立，並把入桂之龍觀光部解決，至此護國軍之局面，乃轉危爲安。

西南形勢，開始發展，公即請岑由滬南下，坐鎮肇慶，一面由桂軍派莫榮新所部協同西江，一面由陸李龍濟光表明態度，並建議組織兩廣都司令部，擁戴岑爲都司令以資領導，龍氏爲大勢爲迫，虛表贊同，岑乃宣佈就都司令，以章太炎爲秘書長，梁啓超爲參謀長，李根源爲副參謀長，公爲財政廳長，周善培爲參議，此爲政學系實掌政權之始。

既有地盤，復有陸李擁護，聲勢顯然不同，公乃策劃發動全國性之機構，即以都司令名義，電雲貴兩粵當局，徵求同意，組織軍務院，對抗北洋政府，推唐繼堯岑春煊劉顯世龍濟光陸榮廷梁啓超蔡錕李烈鈞

李耀漢陳炳焜等爲撫軍，推唐繼堯爲撫軍長，岑春煊爲副撫軍長，遙遣黎元洪爲當任大總統，明令褫奪袁世凱職權，在黎氏未能執行職務時間，大總統職權，由軍務院代行之，岑氏並攝行撫軍，長職事，通電中外，號召國人，擁護中華民國，翊贊民主政體，反對帝制，各方響應文電，如雪片飛來，聲震冠蓋雲集，政治首一階段，已告成功。

對袁軍事方面，由蔡錫等率領，出發川湘，驅逐陳宦湯壽潛，而袁乃調曹錕張敬堯等對抗，大戰於瀘州綦江之間，互有勝負。

而政治形勢，軍務院成立後，護國派已佔優勢，一班元老及疆吏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靳雲鵬李純朱瑞等，均電袁，請取消帝制，以安人心，同時外強，亦來脅迫。袁不得已，乃自動取消帝制，宣佈政事由徐世昌段祺瑞負責，軍事由馮國璋負責，企圖回復大總統職位，保持約法賦予之權力。當袁氏未日暮途窮之時，仍作困獸思鬥，而龍在粵聽命呼應，閉善後會議，竟殺害梁啟超代表湯覺頓，軍務院據報震怒，公與首腦密議，討袁必先滅龍，因調滇軍第二軍入粵北，中華革命軍由東江推進，配合西江肇軍桂軍，暨江防魏邦平艦隊，四面包圍，指向廣州。龍氏在層層壓迫下，退處待斃，旋而由地方團體，出任調停，和平解決。民六五月六日，袁氏因憤懣病歿，黎元洪依法就職，宣佈共和已復，各省休戰。並徇軍務院之請求，下令免龍濟光職，調駐海南，特任陸榮廷繼任廣東督軍，朱慶瀾爲廣東省長，全國統一，大功告成。軍務院宣告取消，公乃隨岑春煊北上，會商國事，回復國會議員地位。

民六秋，北京代總統馮國璋，又與國會互爭職權，非法解散國會，公乃贊成孫中山先生倡導護法，與多數議員南下，在廣州組大元帥府，南北又成對抗之局，嗣而元帥府改組爲軍政府，設總裁制，推岑春煊孫中山唐繼堯陸榮廷伍廷芳唐紹儀林葆懌七人爲總裁，旋孫中山先生因意見不合，離粵赴滬，其餘總裁未

到，無形中由桂系主持。

西南局面，一切軍與政，完全自主，時廣東精軍由軍政府派陳炳焜，再為莫榮新繼任，省長為李耀漢，因軍政府與桂系之關係，莫李對公之西南種種策劃，佩服日深，籌餉助兵，度支興建，責任重要，乃請任公為廣東財政廳長，嗣而李耀漢，翟汪，張錦芳等，因事先後去職，軍政府乃正式特任公升任廣東省長。

公後來對經國治民，抱有大志，嘗謂政治目的，須求富國裕民，運用政策，使國家強盛，民生康樂，始可無愧，自從實際負起廣東政治責任後，乃詳密思慮，設立計劃，大刀濶斧以行，絕不蹈從前官僚拖延敷衍習氣，在省長任內，例如興市政，闢馬路，整稅收，飭官常，雷厲風行，不少假借，風氣為之一變，當時民安物阜，四境清平，未嘗非此種朝氣有以提振之。惜未及兩載，民十西南局面變化，桂系下台，公亦隨之而去，曇花一現，論者惜之。公離粵之後，寄居上海，旋赴日本，自以為學問未足以應變，乃閉戶讀書修養，常夜以繼日，口讀手抄，每讀一書，必窮思索，提出反駁意見，檢討不倦，至義盡為止，而所得者，皆精微奧義，他人所不及者。又着力寫作，會著「中國民主政治」一書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，又研究建設及改良中國各種問題，著成計劃或方案，先後在國內外報端發表，讀者佩之。

數年之後，意氣沉着，默察天下大勢，思有以展布之，民十五參加關稅會議，貢獻利弊，當局為之採納施行者甚多。民十七國民軍北伐成功，總統蔣公，常以國家大計商於黃郛先生，先此黃先生與馮玉祥，在政治上意見不洽，此時馮亦在中樞，黃先生為避嫌計，乃薦賢自代，獻議蔣公曰，「海內有奇才楊暢卿先生，胸羅經綸，足以佐治，凡吾所能者，暢卿無不能，暢卿所能者，有時吾還不及，國家大計，望公商之，」因此，蔣公約見，會談多次，極其歡怡。漸諮詢國是，公乃草獻計劃，洋洋萬言，指陳內外大勢，

建議安內攘外之法，如何內謀真正統一，然後全力對外，條分縷析，精警周詳。蔣公覽畢，嘆爲奇才，乃以國士目之。決延聘出山，翊助中樞。公再四遜謝。人詢其故，則曰：「中國問題，滿途荆棘，困難萬狀，吾出任艱鉅，必招各方怨恨憤怒，犧牲已不足惜，恐仍未濟於事，故遲延未決。」蔣公見賢若渴，愛才如命，安能輕易放過，催勸急於星火。公自審不能再爲自私，爲國家，爲知己，已至不容不出。遂不顧一切，毅然就之。蔣公得公，如魚得水，不異當年玄德之得孔明，名義雖爲幕僚長，實待以賓師之禮，時稱爲暢卿先生，於是事無大小，必商而行。常常晝夜長談，孜孜不倦，言聽計從，左右無一可比。公爲報知己，亦誓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之意。民十九年間，國軍與西北軍中原之戰，擊破豫陝弘圖，收復潼關，以及民廿。應付閩變，瓦解人民政府，民廿。計策西南，恢復統一之局，無一非公擘劃，勳贊蔣公施行。民廿三廿四，在南昌行營，策劃實行保甲制度，縮短防線，圍剿共匪。遣將調兵，機宜措置，多數出於公之佐理。至收復區籌辦善後，推行新生活運動，公之擁護推展，尤爲得力。視其在南昌行營收復區地方善後講習會，迭次演講，「爲甚麼要做新生活運動」總說明，大聲疾呼，淋漓盡致，敘述中國過去一般政治之演變，及其錯誤，引起變亂，導致共匪乘間而入，病根不在政治本身，而在「人心風俗之頹敗」因人心之漓薄，習俗之惡劣，爲一切政治之障礙，援據歷代史乘及近代事實證明，絲毫不爽，目前革心變俗之有效方法，應以「攻心爲上，易俗爲歸」，惟一有遵行新生活，而生活維新，並非採用歐美舶來新式方藥，實就恢復中國固有之道德「禮義廉恥」，春秋管子治齊，所謂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，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」者是也。禮義廉恥何以吻合新生活，又何以根治中國：民類敗垂死之惡症，公闡釋周詳透澈，詞鋒凌厲，聞當時在坐聆訓之官員，不勝感動，甚至有泣下者。其餘代表蔣公精神訓話，所謂「剿匪三分軍，七分政治，一以爲匪禍生於政治不良，剿匪不能專靠軍事，如政治不改革，匪賊可以復生，而改革政治，

主張改善「政制，政綱，政本」。尤在政本之可恃，所謂政本，就人事，古稱人存政舉者也。曠數近時政治腐敗，固由政制政綱之不善，尤在政本之不配。提舉事實，指陳得失，處處顯出眼光遠大，才氣縱橫，而學識經驗，亦足以副之。還有一事，爲外人所不知者，行營軍事行動，時宰生殺，蔣公有時盛怒，發令槍斃官員，無人敢言。惟公權衡輕重，以作緩衝。至怒平，乃婉詞陳說之，得保全生命者，不知凡幾。此本仁愛之心，發爲救人之事也。民廿三國民政府特任公爲湖北省政府主席，時人多以義合酬庸，殊不知此乃蔣公特別作用，蓋湖北地理上爲中國心臟，東西南北樞紐，時抗日戰爭，已箭在弦上，一觸即發，此地如無要員坐鎮，一旦有警，何能應付，爲蔣公遠慮之一日不能忘者，要公當衝，實爲此耳。公受命後，一本平日抱負富國裕民經綸，發施展佈，實行中央所定「管教養衛」四大政綱：一、管理國民，清釐縣區鄉政制，訓練一切行政人員，清查戶口，編練保甲；二、教導國民，推行學行合一。民廿五向武漢中小學教職員訓話，開首說，中國能救不能救，要看教育辦得好不好。如教育不良，一切設施，都白費心力。再說教育是教人爲何做人做事。不是專教人讀書，如祇在文字上教讀，而不從實務上著手。這種教育，爲死教育，不能救國，而且誤國，甚至亡國。其重視實際教育，可見一斑；三、培養國民，公一向對民生極爲重視，到任未久，就辦民生事業：甲、金水農場，佔地數百萬畝，橫跨嘉、漁、蒲、沂、四縣，倡導新的農事，遍植棉花雜糧，平時使其衣食有給，戰後裁兵，寄兵於農，不致失業爲盜；乙、開辦鍾祥水閘，因鄂省水患，由於襄河之失修，能導流作有用之灌溉，使欠水之區，得以水運有利，溢水之區減除災患，爲一舉兩得；丙、計劃長江大鐵橋，武漢爲中國南北樞紐，京粵路之中心，因爲長江所阻，須事接駁，交通大爲不便，財富便爲減削，決議建一大鐵橋，起自武昌余山，止於漢口龜山，此橋成後，京粵路可以直通東由北平至北寧、津、沽、至瀋陽，轉西北利亞，而至歐陸，與各國接軌，不獨中國有利，世界亦有益也；丁、

航空測量，整理田賦。中國地大物博，因田地散漫，經界糊塗，地籍錯誤，國計民生，均有損害。公乃決計整理田賦，從航空測量入手，訓練專才，宗主其事；四、保衛國民，趕編保甲訓練民兵，平時肅清匪患，如遇國難，則調遣與國軍並肩作戰，一一參照清代中興名臣石胡李等計劃，次第實行。以身作則，厲行新生活運動，以振社會風氣。對大局方面，一面作種種國防之準備，與中樞加緊連繫，達其腦心呼應效能。兩年時間，一切佈置，畧有頭緒。民廿五月廿五日，不幸在漢口赴美領事館之宴會，步出碼頭，竟為奸徒行刺殞命。在未逝須臾，左右請詢遺囑，公曰「吾早知必有今日，身已許國，為國而死，夫復何恨，所可惜者，有志未遂，國禍方長耳」。言畢，溘然長逝，時年五十有一，蔣公據報，不勝震悼，急電當地政府治喪，公葬，嚴飭軍警緝兇，必獲歸案窮究。一代奇英，至此終結，棟樑摧折，舉國咸悲。



楊永泰先生遺像

楊永泰先生最近言論集

目 錄

- 一 革命先革心變政先變俗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新生活運動與禮義廉恥……………二〇
- 三 我們應怎樣發揮七分政治的力量……………四一
- 四 現在縣制與縣政的種種特色……………六二
- 五 今後青年自救救國之途徑……………七八
- 六 今後施政方針及對於學生運動之感想……………九三
- 七 努力接受意見與盡其職責……………九六
- 八 醫學與社會……………九七
- 九 治鄂的幾點意見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- 十 合作事業工作人員應負之使命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十一 對於警備旅之懇切希望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- 十二 中國現階段之教育問題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- 十三 今後湖北各學校之訓育問題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
十四	增加行政效率必須推行新生活的三化	一一五
十五	今後努力推行新運的途徑	一三〇
十六	推行新運之中心力量	一三四
十七	今後黨的工作途徑	一三九
十八	造林爲防災要政	一四一
十九	童子軍訓練之意義所在	一四五
二十	區制區政與區政人員的責任	一四八
二一	小朋友們應當自謀幸福	一五三
二二	公民訓練的兩大目的	一五六

附 錄

一	各省政治工作報告之總評及意見陳述	一五九
二	各省保安行政工作之總評及意見陳述	一八九

革命先革心變政先變俗

(這是「爲甚麼要做新生活運動」的總說明)

——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在南碭行營收復縣區地方善後講習會講演——

一、海通以來一般政治思想之演變及其錯誤：

- (一) 技術的追求。
- (二) 政治的維新。
- (三) 政體的改革。
- (四) 新文化運動。
- (五) 國民革命。
- (六) 共產黨之亂。

二、中國病根，不在政治制度本身，而在人心風俗之頹敗：

- (一) 「病的心理」與「惡的習俗」，是一切改革之障礙。
- (二) 完成革命，推行政治，以攻心爲上，易俗爲歸，不能改造整個環境，便爲環境所同化。
- 三、今之談革心變俗者，常有兩種不正確之觀念：

革命先革心變政先變俗

(一) 謂中國國民性不易改變的錯誤；

(二) 移風易俗，混爲一談，不知由移風而進於易俗之錯誤；

甲、會·胡·左·李諸人之中興清室。

乙、國民革軍之北伐成功。

四、革心變俗最速收效之方法：

(一) 凡作之君者，應兼作之師；

(二) 由外形訓練促起內心變化；

(三) 借政治力量掃除社會惡習。

五、結論以上所述，都是爲甚麼要做新生活運動的總說明。

各位同志：兄弟今天借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講習會，要兄弟來有所貢獻，在說話之前，先要向各位聲明的：第一，各位都辦過好些事，很有經驗，很有學識，所有一切的見解，都比兄弟深刻。今天要兄弟來談話，恐怕要像班門弄斧，所說的未見得有甚麼研究的價值；不過既然是個講習會，凡參加這個會的人，都應該各出其心得，來共同研究。所以兄弟也祇得將一知半解的東西，拿出來貢獻各位參考。第二，兄弟覺得自己要說的話很多，可是，會中時間的分配上不能容許。精神講話，本來規定二十小時，委員長自己要多講一點，今因事不能來，以後或許還可以來講的。這二十小時的精神講話，兄弟與熊主任，各担任一半。兄弟這部分，擬分爲五次，每次兩小時。在此短促期間之內來講話，難免有言而不盡之憾；惟

有把認爲比較重要的幾點，提出來說一說，當然也是掛一漏萬。第三，要講話便要有點精彩，要求精彩，又必須經過一番思索，和整理的工夫，才能中肯；兄弟因爲事情太忙，沒有時間做到這一點，只可拉雜的想到那裏，便說到那裏，這都是要請各位原諒的。

一·海通以來一般政治思想之演變及其錯誤

兄弟第一次要講的，假定一個題目：各位要到收復匪區來担任地方長官，或是專員，或是縣長，或是專員縣長的佐治人員，都無非要來推行政治，所負的責任，非常重大。但是，推行政治，需要一個前提。就是說，從推行政治的本身來下手，這種政治，是沒有多大效果的，必須先要攻心。否則，革命不革心，老是草來草去，還是沒有辦法；變政不先變俗，任你怎樣熱心勤政，也永久得不到多大效果。所以今天所要講的題目，便是：「革命先革心，變政先變俗。」兄弟可以拿中國最近六七十年政治演化的情形，來證明這個原則：

我國自海通以後，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，像狂潮般的捲來。國家的主權，陷到風雨飄搖狀態之中，險象環生，一天一天地緊逼。當時一般先知先覺的人，我們不能說他們不知道國家的危險，不想法來挽救；在事實上，他們是很感覺的。並且無時無地不在設法應付和努力奮鬥之中。可是，努力奮鬥的歷程，經過六七十年，迄到今朝，還是依然故我；其結果，反愈弄愈糟，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？現在我們且就近代歷史加一番剖解，來觀察我國近代一般政治人物對於環境之認識，及其救亡圖強努力的動向，就可以體認出這個道理：

(一) 技術的追求 當咸同之世，一方面有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的外患，一方面有太平天國的內亂，那種危險的情形，也不讓諸今日。當時會·左·彭·胡這般人，一面在南方剿匪，一面首都已經爲外國人佔

據，在這種國破家亡的狀態中，他們並不是不感覺到中國已很危險，他們並且夙夜焦慮，很努力的奮鬥，很想在匪亂削平之後，來痛加改革。一方覺得外力壓迫之可恨可恥，但是一方也知道外國的長處，不能不佩服，所以利用外國人編成軍隊來打太平天國。他們還知道外國武器的厲害，大可取法，以為中國形而上的學問很夠，只是形而下的東西不足。船堅砲利，這是形而下的工夫，而這種工夫，却又可以操縱我們中國的運命，覺得不寒而慄。胡文忠國攻安慶的時候，有一次，他策馬登到龍山，瞻西形勢，他很樂觀的說：「賊如在釜底，雖強不足平也。」復馳至江邊，忽然看見二隻外國輪船，開進長江，鼓輪西上，迅如奔馬，疾如颶風。他便覺得有這種東西衝了進來，中國實在沒有辦法來應付。他便變色不語，勒馬回營，中途嘔血，幾至墮馬，以為這已不是我們這輩人所能知道的了。他受了這樣深刻的刺激，到後來就這樣的死了。曾文正也見到這點，所以他說：「欲求自強之道，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，以學作槍砲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作。但使彼之所長，我皆有之，順則報德，有其具，逆則報怨，亦有其具。若在我者，挾持無具，則曲固罪也，直亦罪也；怨之罪也，德之亦罪也。」他們目擊時艱，一種憂心忡忡的情形，於此可見一斑。他們並不是不想改革，知道外國的船堅砲利，機器文明，為我們所不及。所以機器製造局，招商局，造船廠，電報局，水師學堂，軍港，也就接二連三地興辦起來。他們又覺得，專是做倣別人呆板地做去，還是無用，必須先要明白聲、光、電。化的道理，所以又注重聲、光、電。化之學，於是設甚麼格致書院。但是，要研究外國的科學，又非先懂外國的語言文字不可，於是又設立甚麼同文館，延聘外國人，教授英、德、法、俄等國的語言文字，開了天文、化學、算學、格致、醫學等類的科目。並派遣學生往外國學習水陸軍軍械技藝等類洋務。從此以後，學洋文，練洋操，習洋務之風氣，為之丕振。當時士大夫間，莫不以此相矜持，莫不以能談這些改革，為識時務，凡不能談時務，不能懂洋務的，便認為落伍。

滿以爲講洋話，懂點洋務時務，會造洋鎗，炸炮，洋船，機器，就可以趕上外國，可以轉弱爲強了；但是一直努力到清朝末葉，結果還是毫無辦法。

(二) 政制的維新 於是，一般人以爲這個辦法，還不是強國之本。先以爲不及外國人的地方，只是形而下的東西不夠，技術上不如人。這自會，左一直到郭嵩燾這般人，都是這種信念。到後來，一般人以爲他們雖然有點覺悟，終不能使舊中國轉入新中國，造出一種大變化來。因爲他們的見解，還祇是見到一點皮毛，技術只是一種皮毛的工夫。所以當時的中心人物梁啟超會批評過他們說：「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，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政，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，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。」認爲他們這條路，再不能走了，而國家根本的病根，還是在政制不好，非向政制改革這條道路走去不可。所以又鬧成第二花樣，有所謂「戊戌政變」的一幕。自康有爲伏闕上書之後，會經過「百日維新」的極盛時期。但是鬧到後來，也不見得有多少轉機。攷其原因，並不是沒有變法。其實庚子之後，若是按照當時清廷原有制度來說，也變了不少的法，尤其是北洋的直隸，南洋的兩江和兩湖廣東這些有大督撫的地方，改革得很進步。

(三) 政體的改革 可是，在庚子之後，雖然變了不少的法制，還不能馬上強盛起來，究其原因，一般人便以爲單是改革政制，不過是一種枝節的辦法，是一種舍本逐末的見解。問題的中心，沒有把握着，任你怎樣翻來覆去的努力，終歸無用。如是就牽涉到國家的政體問題。所以弄到第三步花樣，就是大革命的爆發。把幾千年來的專制政體粉碎了之後，便建設了民主共和的政體。改革政體的目的，既已達到，應該可以從此強盛起來，乃結果，民生的頹敗，國家的危險，其程度益加深刻，反不如革命以前的安居樂業。照這樣情況看來，改革政體的目的，究係何在？而所得的結果，適得其反，流弊還要更大。把西洋的民主制度所謂「德謨克拉西」搬了進來，什麼議院制，內閣制，總統制，鬧得烏烟瘴氣。每屆選舉，賄賂

公行，國民賣票，議員賣身，選舉一次，國民道德政治道德，就破壞一次，弱點就暴露一次；而且每次電閩的混亂，都是從這些政治的變局中發生出來，弄得醜態百出。這般的流弊，真是令人痛心。一般國民，那有不失望的道理？

(四)新文化運動 經過了第一步技術第二步政制以至第三步政體改革的努力，在這政體改革之後，還是弄得一場糊塗。在這個時期裏，又有好些人，以為從政治來改革政治，是沒有辦法的，只好離開政法的見地，另外找出路。所以到五四運的時候，就轉向到文化方面，以為文化才是根本的問題，舊的文化的軀殼，已經僵化，非把他澈底掃除，從新建設新的文化不可。要改造政治，就要先改造思想，要改造思想，就要從文化上用功夫。所以五四運動以後，高唱思想解放，末流之弊，甚麼自由主義，甚麼社會主義，馴至馬克斯牛克斯這一套東西，就在一般青年智識份子的思想中操了絕大的權威，麻醉一時。固有的學術思想和道德，完全被其排斥與破壞。所謂新的文化的道德，却並沒有替中國從新建設起來。舊的摧毀了，又找不着新的替代的東西，一無所有，徬徨無主。結果，就像大病的人，又加上一層外感，奄奄待斃。但是，這樣一鬧之後，國民革命運動，確得到不少的幫助，使一般的人，容易獲得了解革命主義的機會，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到了國民革命軍事成功之後，也以為非從文化上澈底改造一下不可，可是結果又適得其反，還是不滿人意。

(五)國民革命 第三步第四步的花樣接連的鬧了一氣，末流之弊，幾於不可救藥。可是倒得了一個大變動，一般人以為民主政治之不能行，是由於國民智識不夠，思想落伍，所以沒有成效可言，而且流弊叢生。因此國民革命運動，由醞釀而成熟，全國聞風歸嚮，果然把根深蒂固的北洋軍隊打倒，南北統一完成，國民政府代之而興。總理的革命方略，分爲軍政、訓政、憲政三個階段。軍事統一之後，先行訓

政，然後過渡到憲政，以免再蹈民元以來之覆轍。自十三年以後，大家又很覺得，以為採取歐洲大陸派的議院制，內閣制都沒有好處，明是乃效法俄國革命的辦法，採行俄國的委員制，（除五院制係總理制定外，其餘還是採取俄制。）到現在又已試驗過幾年，檢討結果，利少害多，與原來的用意，多適得其反，不特人民不能滿意，就是我們自己也覺得很不滿意。

（六）共產黨之亂 這樣一來，就引起了許多人的懷疑。或以為俄國的制度，本是很好的，其所以行之而無效，只是歸咎於我們這般行的人不得其法。並且俄國的政治制度，是適於共產主義的需要；我們不行共產主義，而欲收俄國政治制度的結果，當然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要求民族的自救與復興，非實行共產主義不可。於是乎有些熱血淺識的青年，又偏向到共產黨，來參加所謂「共產革命」。這套把戲，又已經演了幾年。他們對外宣傳，很誇耀地說，蘇區的建設，是怎樣的好，前途的希望，又是怎樣的大。一般拿耳朵做眼睛的人，還是被他鼓惑的不少。但是我們到匪區去考察一下，他們不但不行，並且比我們還不行得多。兄弟在不久以前，曾經到過新收復的黎川和廣昌。廣昌被他們佔據了五六年，黎川在從前被佔，嗣經收復後又被他們一連佔據了兩年。時間也不能不算相當的長久，可是，共產黨在這些地方，遺留下來的，又有些什麼呢？就他們認為蘇區北門鎖鑰的廣昌來說，被他們佔領了五六年，他們的設施，除掉效法我們建築了三十幾個碉堡之外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，再找不出他們一點成績的痕迹，我們現在舉幾個實例來說，就可以知道他們毫無施展，依然停滯在舊的圈子裏，掙扎他們那苦悶的生活：

例如：土地廟本是一種迷信的東西，在我們革命勢力之下，看見了這個東西，還要勸導一般愚民不可迷信，有些地方黨部，激烈一點，便領住些人去打倒他。可是在廣昌，黎川經過的地方，看見土地廟土地神，和香爐存在的就很少。到處死了人還是化紙錢燒香。聽說廣昌戰後，錫箔紙錢香燭，就是一宗很

好的生意，和久缺的鹽米一樣的需要。黎川還有一座扶乩的菩薩廟，香火從來很盛，偶像陳列得很多。此次經我們收復之後，才把他的偶像搬開去，在這裏設立了一所兩級小學。廣昌有一個小學教員，年紀已有六七十歲，在過去多少年當起，一直到現在共產黨時代，還要借重他。這樣頭腦冬烘的人，在共產黨認為最重要的文化事業上，還容許他存在，可見他們的一切，都沒有改進的能力。再就廣昌這個地方一般殘餘的百姓來觀察，壯丁都被共產黨拉走了，剩下來的都是老翁。老年婦女，自不必說，就是一般青年婦女，仍然很多固守着纏足的風氣，並沒有澈底解放的努力。其中令人感覺到最普遍最不良的印象，凡是收復的地方，都非常的污穢，滿是攔播塵土污泥髒水，很像多年未掃除，臭氣難聞。黎川、廣昌的蒼蠅，結隊成羣，與人爭食。這些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，清潔運動，共產黨的統治，毫未注意到，任你說的主義震天價響，完全與社會無干。可見共產黨還是中國式的共產黨，所玩的把戲，還是中國的老套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又如分田係共產黨極力標榜而最富麻醉性的策畧，廣昌和黎川，都是分過田的。分田的冊子和分田的標幟，統統都有。但是田塍還是維持着原狀，並未敢加以破壞。因為人民反對破壞，說是：田塍一經破壞，田裏就不能蓄水，沒有水就沒有辦法耕種。共黨也就無法可施，只好遷就作罷。據我們調查：原來匪區的佃戶，並沒有分田的要求，匪區中也沒有甚麼大地主。平日地主，和佃農之感情利害，就沒有甚麼不相容，更無所謂階級對立的觀念，共產黨不問病情，祇管下藥，慷他人之慨，硬要把地主作成打倒的對象，把他的薄田充公瓜分，表示一點小恩小惠。照他的辦法，佃農分田後，收穫的全產量，以百分之五十繳送蘇維埃政府，其餘百分之五十，便歸他耕者所有，地主是完全被剝奪了的。其實如黎川地方，地廣人稀，向來批佃招耕就不易，田租額都佔得很低，大率佃戶佔了百分之七十，田主僅佔百分之三十，還要納稅納捐。照共產黨這樣分田，不但農民得不著甚麼好處，反而吃了大虧了。況且分田之後，農民就直接加

上種種負擔，今天派銷公債，明天預借軍米，後天又要織草鞋，辦兵差，弄到痛苦不堪。據說廣昌、黎川，就有這麼一種情形：佃戶在分田之後，都覺得分田的舉動，有類於做强盜，趁火打劫，把別人所有的東西，硬來佔爲己有，總覺得在天理良心上，很是不安。可是他們又不敢不接受，而暗中與流亡在外的地主，還是通聲氣，有時還設法輸一點租接濟他。這真是中國人的厚道，固有的美德。因此之故，共產黨照冊子上所分下來的田，當然和佃戶原來所耕之田，不免有多少變更，爲整理便利，不免還要按着標幟，叫他們彼此調換。他們回報共產黨，當然說是已遵照變更或調換了，其實他們多數還是願意耕着原來所耕之田。有時另外分配給他們，他就不去耕，弄到匪區中荒田荒地就很多。共產黨也就知道這些上下相瞞的情形，祇好半痴半聾，就是這麼一回事罷了。我們以前的推想，以爲匪區土地問題的複雜，一定很嚴重。趕到收復之後，經界依然，誰主誰佃，清楚得很，並沒發生甚麼了不得的糾紛。共產黨的把戲，實在沒有甚麼巧妙，他的命令，還是一樣不能徹底。諸如此類的例證，不勝枚舉。最有意思的，我在南豐，住在一所內地教會的房子，是陳辭修總指揮預備招待客人的。那天早上，我看見客廳裏擺了一個大書攤，都是最近搜集共匪的書報和文件。我隨便把他翻了一翻，其中共匪的上級機關，對下級下的命令，就很多。其中都是痛責廣南等地各級蘇維埃政府如何地不努力，工作如何地錯誤，如何地有名無實，借故搪塞，因循敷衍，都無非是一些嚴厲督責的話，並沒發見甚麼確有成績，分別嘉獎的，這就可見他們的能力了。

從這些方面看來，共產黨統轄的地方範圍，並不甚廣，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，對於違犯禁令的人，動不動就殺，甚且整批的殺，可謂雷厲風行了。但是他們的法令，還是不生效力，所施的政制，還是不能支配整個的社會，甚至與社會全無影響。即所謂中央區，已是他們人才與政權集中的地方，廣昌更是北門的鎖鑰，結果，也不見得有什麼成績在那裏。他們埋頭苦幹是費了五六年的工夫，所造出來的成績，只是閻

里坵墟，家破人亡，一種殘酷淒涼慘切地獄般的世界。

二·中國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風俗之頹敗

我們縱觀這幾十年來內外時勢的推移，由咸·同末年談時務洋務專從技術的追求做起，演進而成戊戌·庚子以後的政制維新。由政制的維新，再演成辛亥政體的改革，都失敗了。於是民國八九年間新文化運動代之而興。自是而後，國民革命像成功而實在尚未成功，共產革命則完全慘敗了。費了那麼多的聰明才力，經歷了那麼長的時間，變換了種種式式的花樣，凡是東西各國辦而有效的東西，都搬到中國來試一試。這一幕還沒試完，那一幕又準備另試，試來試去，不但沒有收到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實效，結果愈試愈糟糕，於是一般憂時之士，就覺得中國民族的前途，很可悲觀，認為這個民族，實在是老大了。經過先知先覺五六次的診斷，無論注入什麼新的東西，都接受不了。不但不能接受，而且每注入一次，他的病便加重一次。在這世界潮流激盪國際風雲莫測之際，這老病的性命，真是風燭殘年，可怕得很。如果再無起死回生的聖藥來救他，祇有準備後事了。

我們處於今日，身當其衝，時代環境，既然不容許我們再觀望，難道就坐以待斃嗎？中國害了這樣不起的沉疴，他的病源，究竟何在？又有沒有昭蘇的希望呢？我們仔細推究起來，他的病根，既不在技術之不如人，那可以迎頭趕上的；亦不在政制政體之無作用，那不過是施政的工具，與施政的原動力無干；尤不是因為沒有採行共產主義的原故。中國不能行共產，連俄國到現今也行不了甚麼真正的共產主義。中國所謂共產革命，就是閻·獻復生做些殺人放火的勾當，就是認賊作父做些漢奸賣國的行爲罷了。還夠得上說是救國家醫國病的方法之一嗎？我們的病根，實別有所在，實在於風俗人心之頹敗，絕非這些藥方所能醫得好的。我們的前輩在過去，已經換了五六批醫生，都沒有拿着這個病根，而且望救心切，藥石亂投，

不但沒有效果，反使深入膏肓，幾乎要斷送生命。我們現在既知道人心風俗之壞，確是病根所在，所以要革命必先革心，要變政必先變俗。

(一)病的心理與惡的習俗是一切改革之障礙。我國這幾十年人心風俗之頹敗，實不可以言語形容。在個人方面說，則為「病的心理」，在社會方面說，則為「惡的習俗」，有了這兩種大障礙，擺在我們進步的前途，如果不把他掃蕩淨盡，一切的政治改革，終沒有推行的可能，光明的境界，永遠沒有達到的希望。所謂病的心理與惡的習俗，再具體一點分析起來，就公務員說，便是徇情·貪污·虛偽·不負責·作威福·假公濟私·因循苟且；就人民說，便是懶惰·萎靡·懦弱·污穢·雜亂·渙散·愚昧·無公德心·自私自利·家族觀念太重·國家觀念太薄。這些毛病，個人社會，都相沿成風，牢不可破，無論在政府機關裏或社會上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得到。整個的國家，整個的社會，都在這種惡的勢力支配之下。

(二)完成革命推行政治，以攻心為上，易俗為歸，不能改造整個環境，便為環境所同化，我們革命的敵人，固然是帝國主義·軍閥·赤匪·但這都是有形的敵人，尚好應付，並不可怕。最可怕而最不好應付的，只有無形的敵人——病的心理·惡的習俗。我們如果不能克服他，那末，主義儘管好，政治儘管完美，終歸沒有效果，徒費心力。所以無論推行任何一種主義，或是推行任何一種政治，都應當集中全力先向此猛攻。古人云「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。」也就是看到了這一點，先要將心坎中的病根，拔除淨盡，風俗然後可正，政治才有辦法。如果不從此處下手，我們日常待人接物處事，就會遇着這種無形的敵人，很像萬箭齊發一樣，向我們的心坎裏襲攻，我們於不知不覺之間，就被他挾持住，不能自拔。我們革命的精神，就漸漸的為這種惡的勢力征服，而被其同化。任你有好計劃，一擺到這個環境內，一定行不通。任你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，一墜落到這個圈子裏，也終歸變作惡人，同流合污。其不能振作，與衆人同，其無

能為，亦與衆人同。

我們無論管理一區一縣，以至一省一國的地方，均應以攻心爲上，先發制人，專找這種無形的敵人去猛攻。否則一切法令則都是騙人的官樣文章，都可變成因緣爲好的工具。縱使能夠實心實力照住法令章則去做，也不過得著一點一時的表面的效果。如果這個管理的人，一離此地，便又化爲烏有，仍回復其舊日惡的狀態。所謂「其人存則政舉，其人亡則政息」，這就表示政治的基礎，沒有真正確立的緣故。所以爲政根本之道，要歸結到革命先革心，變政先變俗一點，就是說在政治工作之前，必須先下一番改革風俗的工夫。風俗方面，如果有了很大的轉變，很能夠振作起來，那末，任何政治，任何主張，祇要合乎社會國家的需要，就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事半功倍了。

三、今之談革心變俗者常有兩種不正確之觀念

革心變俗，是完成革命改革政治之最大前提，他的重要性有識者都公認，也用不着再詳說了。我平日和好些朋友討論到這個問題，就很容易發生兩種不正確的觀念，我要在這裏糾正一下：

(一) 謂中國國民性不易改變的錯誤——第一個不正確的觀念就是說革心變俗，說起來雖是十分重要，做起來却是非常困難。尤其是我們中國這個頹敝不堪的老大民族，要想改變他的國民性，更是難於登天。況且唯物史觀的學說現在浸淫於中國，人慾橫流，天理滅絕，要想革他的心，變他的俗，豈不是難上加難嗎？我說這個觀念是根本的錯誤了。曾文正公說，「風俗之厚薄，繫於一二人心術之微」。在上位的人，做社會領袖的人，心術不善，風俗一定會薄，心術善，風俗一定會厚，如響斯應，如風偃草，歷歷不爽。俗語格言中常有這麼一句話「有不能戰的將，而無不能戰的兵」，就是說無論甚麼地方招來的兵，祇要訓練得法紀律嚴明，都可以打勝仗。並且常常看見有些兵，在那邊常常打敗仗，改編到了這邊之後，就常

常打勝仗。可見能戰不能戰的責任不在兵，而在將了。我現在也可變換一句話說「有不能化民的領袖，而無不能感化的人民」，用不着把外國歷史作例證，就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，我們這個民族，有了幾千年的歷史，的確悠久而老大，可是在幾千年的當中，不知興了幾次敗了幾次。這一代興，那一代敗，這一代化好，那一代化壞，很像循環無端，起落無常。就是同一個時代，兩方對抗，附了這方的人就化好就興，附了那方的人就化壞就敗，在我們中國歷史上，尤數見不鮮。所以一個朝代的興亡，不必等到他的最後運命揭曉，纔能決他的雌雄。我們只要從兩方面來看他們的人心與民氣，就可以斷定。我們看興朝的方面，他們的人，在心理上行動上，莫不表現一種公忠興奮的朝氣，反之，要被打倒的對方，他們的人，在心理上行動上，莫不表現一種貪私萎靡的暮氣。從歷史的轉變中，兩兩對照，幾乎成了一種確定的原則。可見人心風氣與一朝興亡的關係，非常密切。我們只看當時風氣之孰振孰萎，就知人心之孰嚮孰背，就可以決定孰成孰敗。在這一興一亡交替之中，其所據的空間，所處的時間，所憑藉的人民，都是一樣，並不是兩個民族，尤不是兩個時代。其所以成敗殊勢好壞異形者，即在管理政治的人能否轉移人心改變風俗以爲斷。怎見得我們這個老大民族，一敗即不可復興一成即不可復變呢？天下無難事，最怕有心人，我們就應該知所自勉了。

(二) 移風易俗，混爲一談，不知由移風而進於易俗之錯誤——第二個不正確觀念，就把移風易俗混爲一談，其實這是兩個階段。易俗乃移風最大的成功，移風乃易俗最初的步驟。易俗以全社會民族爲對象，移風以政治的中心幹部和社會上一部份的知識份子爲對象。範圍有廣狹，關係有淺深，所成就的事業，自有大小之不同，所收的功効，更有一時的和長久的種種之差異。拿中國已往的歷史來說，如孔子治魯，管仲治齊，子產治鄭，商鞅治秦，諸葛亮治蜀，都能化民成俗，其他的先知先覺的努力，多是祇收到

移風的工夫，還沒有認真做到易俗的工夫。所以他的事業成功和效果獲得，總是可暫而不久。雖然轟轟烈烈的幹了一場，到了相當的期間，他原來的精神，便不能維持下去。我拿現代史會·胡·左·李諸人之中興清室和國民革命軍之北伐成功，就可以做實例的證明。這都是革心變俗的工夫，還沒能夠澈底做去的緣故。

甲·會胡左李諸人之中興清室 當滿清中葉以後，國民壞的心理，政府惡的徵象，都充分地暴露了。會·胡道班人很知道風俗人心之壞，想要挽救過來。但是他們都是些書生，怎樣能夠負起這種大的責任？他們認定：如果要向這方面努力，就非先形成一個中心幹部的團體來以身作則轉移風氣不可。他們這班人很得力於王陽明躬行實踐的工夫。不特他們幾個首領如此，就是他們的書生團體，也都能本此精神，由辦團練來做成實力的基礎，由衛禮教來樹立精神的信仰。在他們幾個人領導之下，「硬幹」「苦幹」起來。當時太平天國的奉天主教的。會·左諸人初出來打他的時候，並不是標榜保清，而是護教。他們第一次的檄文，完全以擁護儒教，消滅夷教為號召，以激起一般人之同仇敵愾心。因為自文王·周公·以至孔子一脉下來的儒教，在這時候，被太平天國破壞，起了極大的動搖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認為一個朝代的變換，還沒有很了不得的關係，至於中國之制度文物，那就絕對不容許破壞的。所以他們對於洪·楊之戰，毋寧說是衛道或衛教之戰。他們最得力的地方，也就是對於昌明禮教轉移風氣，會痛切的做了一番工夫。換言之，也就是攻心的工作。可惜他們的努力，祇能感化中心幹部的團體，還不能把整個的社會有所改革。由成功這一方面說，憑藉了他們中心幹部的覺醒，有了這種興奮的精神，蓬勃的氣概，來抵抗太平天國末年那種萎靡腐敗的風氣，當然可以壓倒一切。由失敗這一方面說，因為他們對於當時整個社會的病態，尙未能加以有效的治療，所以他們在用兵作戰長期相持的當中，就屢屢遭遇了很大的阻力，發生了無窮的困

難，弄到常常要犧牲自己良心的主張，來遷就事實，以求有濟。還要想盡法子，和惡勢力謀妥協，以免牽動大計。所謂中心幹部，所謂新興勢力，耳濡目染，形格勢禁，不但漸漸軟化，而且天天惡化。趕到金陵攻下之後，他們本身的弱點，就完全暴露。湘軍萬不能再用了。湘軍衰落，淮軍代興，淮軍衰落，小站新軍代興，一脈相承，更有江河日下之感。李鴻章練淮軍，自始即與會。左不同，並不以書生爲骨幹，當時環境也兩樣，更無所謂衛道衛教之說，祇以功名心事業心驅策人。袁世凱練小站新軍，益變本加厲，其目的在造成私人勢力，純以利祿奔走天下士，恆挾住用些使貪使詐的策畧，不但不能轉移風氣，中國的風氣，反而因此敗壞到極點，至今不可收拾，這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。

乙·國民革命軍之北伐成功 再就最近的事實來講，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的廣東國民革命勢力，養精蓄銳，正如旭日初昇，無論黨政軍各方面，莫不充分表露蓬勃的朝氣。政治還清明，軍隊很有紀律，一般國民的精神，都很緊張。當時的政府，很能支配社會民衆的心理。一切的刑賞大政，都能雷厲風行，破除情面，處處表示出剷除腐化的精神。一種興術之氣，確是充塞了嶺南，而漸瀾漫到各省。整個社會的風氣，雖然還沒有多大改變，但是黨政軍所領導的團體風氣，確是起了很大的變化。所以不到三兩年的工夫，先聲奪人，全國衝動，由珠江流域，衝到大河南北。一般軍閥官僚，望風披靡，畢竟造成了南北統一的局面。這就是以革命勢力的雄風，來克服一切反革命勢力的暮氣，便如摧枯拉朽，一切反革命勢力，便都受革命勢力的領導。

可是到了後來，北伐完成，所控制的範圍加大，而所存的朝氣就漸漸地淡薄。反革命勢力的根基，本來很深厚。在當時雖然暫時僵伏，到了後來，又漫漫地抬起頭來，顯示了本來面目。結果，革命勢力便與反革命和不革命的勢力，趨於妥協，以至被困於他們勢力的重圍，而起了同化的作用。所以這幾年來，黨

務上，政治上，軍事上，不特毫無革新改進的成績，而且外患日急，九一八之變，便集國難之大成。國事愈弄愈糟糕，國命愈弄愈危險，革命的前途，非常黯淡。這個原因，就是由於從前只有一點努力，僅僅做到領導團體的移風工夫，對於一般社會環境，還沒有切實領導他們去改革。只是一小部分人樹立一個小規模的新風氣的集團。當然敵不過廣大的舊勢力的集團，結果，自然非被軟化不可，並且非被同化不可。掉在陰溝裏，那裏還有不同流合污的道理呢？

所以，病的的心理與惡的習俗，沒有改革，沒有痛痛切切的做一番化民俗的工夫，無論你怎樣提倡革命，無論搬用什麼制度，終歸白費氣力，弄得四不像。我們從已往和現在的事實來證明，這都是一種必然的歸趨。縱或表面稍有成績，也不過像曇花一現，馬上化為烏有。但是在這點成績創造的歷程上，你所費的氣力，已經是得不償失了。你如果稍有疏忽，或是離開那個地方，上下四圍的惡勢力，還是緊迫而來，完全恢復他原來的權威，甚至來一個大大的反動，也未可知。

由此看來，我們今後不談革命不談政治也罷了，如果要完成革命改革政治，就得做一番移風的工作，更要做一番易俗的工夫。兩事本是一貫，是要以身作則，推己及人，上行下效，由近而遠，由小而大，從腳踏實地做起的。小做則小效，大做則大效，萬不可以淺嘗輒止。如果祇知為革命為政治努力，而不知從移風方面努力，那是徒勞無補，絕不能有成。如祇能移風而不猛向易俗方面努力，也是事倍功半，縱有所成，亦不能支持久遠。這是事實教訓我們，我們更應知所從事了。

四·革心變俗最速收效之方法

我們從上述種種方面的觀察，綜合起來，可知革心變俗的努力，對於政治的關係，實在非常重要。但是，應該怎樣進行呢？應該採用甚麼的方法，纔能於最速之期間，發生最大的效力呢？

(一) 凡作之君者應兼作之師 從前一鄉一邑之中，有德高望重的人，並不要做官，一鄉一邑的人，自然被其感化，這種實例不少。如漢之賈彪，徐穉，以及宋之林逋，就是這一類代表的人物。賈彪有兄弟三人，皆有高名，當時的人稱讚他們說是：「賈氏三虎，偉聲最著。」徐穉也是恭儉義讓，所居服其德。他是南昌人，曾下陳蕃之榻。林逋隱居西湖孤山，杭州的人都慕其高風。這些人皇隱居在野，修德立行，而一般人都受其感化，實是一種潛移默化最好的辦法；但是，在野感化的工作，還不如在位之易於進行。孔子講學時代，對於社會的影響還小，後來到魯國做了一次宰相，便特別的發生效力。自謂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這就是由於作君作師，雙管齊下之功。雖在野有在野的辦法，在位有在位的辦法，可是前者收效小而緩，後者收效大而速。因為在位來改革風教，一方面賞以勸之，一方面罰以懲之，較之單純的修德感人為有力。所以孔子說：「聖人之治化也，必刑政相參焉——化之弗變，導之弗從，傷義以敗俗，於是乎用刑矣。」他秉政七日，便把兼備五惡之亂政大夫少正卯誅殺了。治魯三月，雖然還來不及把魯國整個的社會來改革，可是他的成績，已經能夠造成「夜不閉戶，道不拾遺，男尚忠信，女尚貞順」的風俗。所以改革風教，若專作之君而不能兼作之師，雖禁令森嚴，日事誅殺，必不見得有何效果。若專在野而作之師，純賴人格之感化，縱可推及於一鄉一邑，而其效也甚暫甚微。孔、孟及耶穌之教，當其生時，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；都在死千數百年才發生大效，可見能作之師者，非有政有刑以濟之，也不易大行其道，則作之君者，不問是一縣一區或一省的首長，自不可輕輕放過，應該隨時隨事隨地，都有能作之師的注意與努力。不但是做牧尹，實在兼作牧師。這一點要大家都十分認明的。

(二) 由外形訓練促起內心變化 我們再進一步來講講革心變俗的辦法，當然以改良心理和習慣為目標，大概可分為兩條路：一是從內部修養，慢慢的發揚出來，一是從外面的訓練，質輸進去。前者是由精

神表現到形式，要由內心修養，發揚出好的道德行爲；後者是從形式感覺到精神，要由外形訓練，使內心起了好的變化。我們不是聖賢，多數國民，更不能期望他都做聖賢。如果以悠久的歲月，來叫各個人去閉戶潛修，恐怕修養還沒有端緒，國家已經滅亡，故我們轉移人心，就要注重外形的訓練，來陶冶他們的好品性。就要改良日常的生活，來養成他們的好習慣。例如：一個軍人，受了長期的軍事訓練，一舉一動，總能表現多少軍人的精神。他心理上，不期然而然的總起了多少變化。如遇長官，便覺得非敬禮不可，路上行走，非挺胸直腰提起精神不可，做事非簡單敏捷不可。此外再就工人、農人、商人說，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凡是久於做工的人，或是耕田的人，或是做買賣的人，我們一看見他的容態，差不多就可以分別出來。這就是個人的外形內心都受職業和生活的影響，實非常之大。因爲各人在各自生活的訓練中，無形地養成各殊的習慣，就會表現出各殊的容態。所以外部的生活方式改變了，內部的精神，自然隨之而變。我們正可以利用此種感應的力量，同樣的訓練一般人的生活，使一般人內部的病態，不良的惡習，逐漸汰除。這是移風易俗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。我們做政治工作的人，一定要走第二條路。自己以身作則，以表裏如一的行動，爲一般社會的表率，逐漸的推及團體內的人員，進而推至一般社會，這也要大家切實認明的。

(三) 借政治全力掃除社會惡習，要剷除社會一般惡的習慣，非用非常的手段不爲功。回教最能看透這個道理，謾罕默德一手拿寶劍，一手拿可蘭經，就是表示要以武力政權來推行他的教義，看你還是願意接受可蘭經，還是願意吃寶劍？這樣一來，在他武力與政權所及的地方，便成爲教義感化的地方。所以弄到結果，回教徒的精神，團結甚堅，收效很快。迄於今日，受回教支配的地方，還有土耳其和中亞細亞各小國，很能發揮他們教義的精神。就是我國的新疆，也在他們教義勢力之下。我提出這種以武力和政權來

掃除社會惡習的辦法，並非我有意要來提倡推行一種什麼宗教。不過從這一點便聯想到本黨。本黨既有武力和政權，而且有很完善的主義，而結果，對於主義之推行，與諸般政治的改革，爲什麼沒有效果，反要愈弄愈糟？推厥原因，就是所有的努力，專在改革政治制度本身上用工夫，沒有在病根所在的風教方面下手。現在我們已經知道，任何一種政治，能否改進與推行，其先決條件，就要看風教之能否改良。我們就應該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，又佐以武力與政權，以排除一切教化之障礙或惡的勢力，一切政治，才能順利的推行。這一點也要大家澈底認清的。

(五) 結論……以上所述都是爲甚麼要做新生活運動的總說明

今天我講了兩個多的鐘頭，列舉了種種的史實和例証，都是說明革心變俗之必要，是做政治工作前提的前提。也就這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」的道理。我們要完成革命，改革政治，復興民族，舍此而外，別無最急最要的方法。今天三翻四覆的申述，雖不免繁冗可厭，其實千言萬語都是「爲甚麼要做新生活運動」的總說明。委員長蔣先生自提倡新生活運動以來，已講演了好幾次，一切新生活運動的意義，和運動的方法，都說得很透明，印有專書，想各位都已讀過。爲避免重複起見，凡是其中已有詳細指示的地方，兄弟就用不着再說了。

新生活運動與禮義廉恥

——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昌行營收從縣區地方善後講習會講演——

各方對於新生活運動連帶而生的三個疑問：

第一 中國固有的道德很多，何以新生活運動特別提倡「禮·義·廉·恥」，豈不是掛一漏萬，願此失彼嗎？

人類道德的總檢討：

(一) 超時間空間的道德；

(二) 帶時間空間性的道德：

甲·私德……家族主義下的社會之道德。

乙·公德

子·大同主義下的社會之道德；

丑·天下主義下的社會之道德；

寅·國家民族主義下的社會之道德。

第二 「禮·義·廉·恥」確是中國固有的社會公德之一種，然實屬平淡無奇，而久服無效的古方，並不是舶來品的特效藥。中國病情複雜得很，可以拿這個古方當做救國萬應靈丹嗎？

(一) 「禮·義·廉·恥」確是中國有名的古方，然已往的中國，曾照方服藥？如果藥是服了，並不是用這個方或是偶然兼採這個方，而任意加減，以爲別個主方之助，那不能斷定這個古方爲無效。

(二) 「禮·義·廉·恥」確是中國固有的古方，不是外國發明的特效藥。可是在現代國家主義下的東西洋各國，他們維持社會的通用良藥：化分起來，其中含了「禮·義·廉·恥」的成分就不少。外國無此方而有此藥，則中國這個古方，更值得重視。

(三) 「禮·義·廉·恥」能否當做救國萬應靈丹，應以藥是否對症爲斷。現在中國的病情，雖是很複雜，然推究病源，確是多因爲味禮義無廉恥所致。所以我們的主要丹方，祇有重用「禮·義·廉·恥」四味藥，長期照服，不可任意加減，尤不可中西雜投。

第三 「禮·義·廉·恥」爲什麼一定要從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中表現出來？這是要從內心修養的美德，若專注重外部形式的表現，豈不是跡近淺薄易流於作偽嗎？

前第一次講話，以「革命先革心，變政先變俗」爲標題，千言萬語，所講的都是做新生活運動的實事，都是爲甚麼要做新生活運動的總說明。關於新生活運動的內容與其重要性，委員蔣先生好幾次的講